



人民创造历史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的来历

屹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由17000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的不朽丰碑。其碑心正面镌刻着毛泽东所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镏金大字的碑心石，长14.7米、宽2.9米、厚约0.6米，是整个纪念碑中最大的一块石料，也是我国建筑史上罕见的完整花岗岩。它采自青岛浮山，起初重达300多吨，从1953年3月31日正式动工开采，到10月13日顺利运抵北京，历时7个半月，共计有7000多名工人参与其中，整个采运过程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王政堂

千挑万选花落浮山

1949年9月30日，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在研究设计方案的同时，纪念碑的施工准备工作也在紧张有序进行。其中，建筑石材的准备是重中之重。按照设计方案，纪念碑的碑文要刻在7块高2.4米、宽4.62米的石块上，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要刻在一块长约15米、宽约3米、厚约0.6米的整块碑心石上。为了保证碑心石不折断，开采石料的毛坯厚度必须达到3米，这意味着毛坯石料将重达300多吨。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广泛听取专家意见，最终确定采用花岗岩，因为这种石材不仅色泽端庄大方，更以坚硬耐腐著称，象征人民英雄精神长存。负责这一艰巨任务的施工组组长陈志德等专家先是查阅了大量资料，掌握了全国各大山脉的岩石情况，又到全国各地历经3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带回了许多石样，送至清华大学材料实验室进行质量、密度、耐酸、耐腐蚀性等测定。经过严谨细致的检测、评审，一致认为，青岛浮山的花岗岩最为合适，它具备硬、韧、纯、细等特点，其石英含量成分高，石质坚硬耐风化，光泽颜色素静淡雅，宛如为纪念碑量身定制，而且当时青岛就有铁路通往北京，距离北京相对较近，经综合考虑，最终决定采用青岛浮山的花岗岩作为纪念碑的碑心石。

集思广益开采巨石

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对于碑心石（当时称为“大石料”）的开采运输高度重视，1952年12月13日，专门致函青岛市人民政府协调此事。1953年1月13日，青岛市委召开研究采运石料工作会议，市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北京方面派遣13人到会，并制定了系列会议汇报及学习制度。国营青岛建筑材料公司第一石厂把大石料的采运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精心挑选了一批政治觉悟高、技术过硬的工人参与这项工作。作为施工组组长的陈志德工作非常认真，考虑问题非常周到，每天都做工作记录并向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报告情况。

经过陈志德等专家的周密勘查，大石料的开采位置定在浮山的大金顶，1953年3月正式动工。但如何把一块重达300多吨的巨石开采出来，专家们却犯了难。刚开始想通过放“闷炮”爆破的方案，但怕控制不好药量，对石料造成破坏，只能放弃。正当人们一筹莫展之时，陈志德等听取了老技术工人朱培成提出的开采办法：“蚂蚁啃骨头”，虽然“笨拙”但最为稳妥。工人们先在选定的石料四周画出标线，用锤子和凿子凿开5米深的槽，使石料凸显出来，再沿着石槽在预定剥离面上凿出若干楔子眼，在石料长边两边相对凿出8个放置千斤顶的窝窝，各放置上200吨的千斤顶。然后，由几十名工人手持重锤将铁楔子插入预定的剥离线中，按照口令同时锤击，最终历时3

个多月，于1953年7月将重达300多吨的大石料成功地从岩体上剥离下来。

协作配合运抵北京

大石料开采下来后，如何运下山、运到北京去，又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青岛市政府组建了由公安、铁路、采石厂等单位参加的大石料搬运委员会，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积极协调国内其他部门配合协作。其中鞍山钢铁公司出借4个能顶100吨重的“油千斤”，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等单位出借大量钢丝绳和铁划子等器材，青岛建设部门出借2台推土机，青岛搬运公司起重队抽调得力干将组成了300人的运石突击队。

1953年8月，搬运工作正式开始。为减少搬运工程量，工人们就地对大石料进行了第一次加工、整形，减重至280吨。运输队利用山坡自然坡度，采用杠杆原理，将大石料抬起、架空，用钢丝绳绑牢，在斜坡上铺设道木和铁轨，顺着铁轨缓缓滑落到了平地。搬运下山时经转向、翻身，对大石料进行了第二次精细加工，重量减为约102吨。此时距火车货运站大约15公里的路程，工人们提出采用最古老的方法——滚杠，先在路面上铺设枕木，在枕木上摆一排由鞍山钢铁厂提供的无缝钢管，又做了一个具有减震功能的底座，再把大石料放到底座上，用3台大马力拖拉机牵引着缓慢前进。短短15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34天，终于到达火车货运站。但当时国内单节平板车皮最大载重仅为90吨，经过科学论证，按超载10%相对安全标准，又对大石料进行了第三次加工，最终减为94吨，连同束车设备与垫木共重100吨，基本符合要求。10月6日，载着碑心石的专列，以直线20公里/小时、弯道及进站10公里/小时的速度，历时7天，于10月13日缓缓驶进北京前门西车站，朱德总司令亲自带了一队人，打着彩旗、敲着锣鼓，在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到达北京火车站后，工人们继续用滚木运输的方式，又历时3天，于10月16日，将大石料运到了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工地，经过进一步雕琢加工，最终“瘦身”到了60吨。按照最初设计方案，纪念碑的正面是朝南方向的，但在建造过程中，考虑到参观人流主要是从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观众主要集中在广场北部，这样就看不到纪念碑正面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了。最终纪念碑一反传统的“坐北朝南”建筑布局，改为朝北一面为正面。施工组借助首钢支援的两台桅杆式起重机，稳稳地将碑心石安装完毕。著名书法家、雕刻家魏长青担负起雕刻纪念碑题词和碑文的任务，首先将所写原稿按碑的尺寸放大，并用“阴文”镌刻，力求字形与原字神似，并以紫铜为胎，采用我国传统的镏金工艺做成金字镶嵌进去。与此同时，汉白玉浮雕创作进展也十分顺利，10幅浮雕展现的不同历史时期172个英雄人物栩栩如生，充分反映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从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动土兴建，到1958年4月22日正式竣工、5月1日落成揭幕，历时9年，巍峨壮美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终于建成了，镌刻在来自青岛的碑心石上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永不褪色。 据《学习时报》

周仁研究古陶瓷

1953年，新中国建设初兴，一项关乎文明传承的任务悄然落在中国科学院肩上。经多方举荐，已过花甲之年的周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当时国内陶瓷学界尚笼罩在西方理论之下，周仁却独树一帜，坚持科学研究贵在自有创见，反对亦步亦趋。他亲自组建国瓷研究组，以“原料考据”与“工艺复原”为双翼，立志重现康乾时期的瓷艺巅峰。为探寻古法真谛，这位白发学者屡次率队深入窑址：在景德镇盛夏的窑厂里，他执杖攀上炙热的窑顶，凝视釉色与烈焰共舞；在龙泉的崇山峻岭间，他俯身捡拾千年碎瓷，每一片残片在他眼中都是解读古老密码的密钥。

面对景德镇瓷质提升的困境，他提出两项创见：回归古籍所载的本地高岭土，重建明清制式的小型柴窑。当世人质疑“土法落后”时，他从容应对，坚信技术价值在于合乎物理之道。经反复试验，复原的小窑不仅重现了温润如玉的釉质，更让失传的“高岭土-石英-水云母”体系重放异彩。

在田野考察中，他特意邀请画师将匠人的拉坯、利坯等手工技艺绘制成图谱，开创了“科技分析与人文记录”相融的研究方式。1958年，《景德镇瓷器的研究》问世，这部以化学与矿物学方法解析传统彩釉工艺的著作，成为陶瓷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1978年，周仁研究团队在古陶瓷上的研究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研成果奖，1982年再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周星 据《人民政协报》

茅盾赏识《百合花》

1958年3月，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这篇5000余字的小说，以解放战争为背景，通过通讯员、新媳妇和文工团女战士三个角色的细腻刻画，展现了军民之间的深情厚谊。然而这篇如今被称为经典的作品的发表却颇费周折。

转机出现在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先生在全面阅读当时短篇小说的基础上，撰写了《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后。在这篇发表于1958年6月《人民文学》的评论中，茅盾用大量篇幅重点分析了《百合花》，并以“清新、俊逸”四字作为评价。他特别写道：“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小说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盛赞其“结构谨严，没有闲笔”，且“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作为文坛领袖，茅盾的评价具有风向标意义。同年9月，《人民文学》转载了《百合花》，这是该刊罕见转载地方刊物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百合花》与王愿坚《七根火柴》等三篇茅盾推荐的短篇合集出版，并在前言中特别说明推荐缘由，还将茅盾的评论作为附录一并刊印。

茹志鹃坦言：“是茅盾同志对这个作品的热情鼓励，使我更坚定了决心和信心。”此后，茅盾持续关注她的创作，又对《静静的产院》《春暖时节》等作品给予评价，冰心等作家也相继撰文讨论。1961年，上海作协连续四次召开“茹志鹃创作讨论会”，这种重视程度在当时青年作家中绝无仅有。

茅盾对《百合花》的赏识，不仅成就了一位优秀作家，更彰显了文坛大家提携后辈的可贵传统。他凭借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开阔的视野，从众多作品中识别出这篇风格独特的佳作，并以其影响力为其开辟道路。 周二中 据《人民政协报》

